

教育期望与影子教育

——论双减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

刘颖超¹ 秦志爽²

(1. 吉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118;

2. 吉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118)

【摘要】随着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大,影子教育在我国发展的非常快速,随之而来的各种教育隐患也越发凸显。2021年我国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了“双减”政策,旨在形成良性健康的教育秩序,政策推进过程中家长们群体性焦虑问题也日益严峻,其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孩子能否通过教育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本文在家长教育期望与影子教育发展的内在关系基础上探讨双减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通过分析目前家庭教育和孩子学业获得所遇到的阻碍,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教育期望;影子教育;双减政策

一、高教育期望下发展的影子教育

(一) 相关内涵

1. 教育期望

教育期望分为父母教育期望和学生自我教育期望两部分,父母教育期望就是父母对子女将来所达到的最高学历的期待与预期,自我教育期望反映了学生个体对于自身以后所能达到的最高学历的预期和期待。教育期望作为教育获得的内生动力直接影响着家庭教育的构建和投入。教育作为当今社会流动和阶层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并且随着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以及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大,高学历成为社会筛选的重要指标,因此现代社会家长普遍拥有较高的教育期望。父母受先赋因素影响形成的教育期望会对孩子产生如默顿所说的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式的强大作用,从而影响子女的教育期望、学习表现与未来发展,而子女受自身教育期望推动下所获得的学业成就也会对父母的期望程度产生影响。

2. 影子教育

国际上的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最初由史蒂文森(Stevenson)和贝克(Baker)提出,指内容仿效正规教育体系,随其变化而改变,且成本主要由私人承担的课外补习活动相较于正规教育体系统一而标准的制度安排,影子教育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因而受到学生和家长的广泛欢迎,不断发展壮大。Bray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概念:补习教育的存在依赖于主流教育,它因主流教育的变化而变化,是对主流教育的补充,是主流教育的“影子”。在我国最早引用“影子教育”概念的人是彭湃,他认为“影子教育”是由私人支付的主流教育之外的补充性教育,是以学术性

课程为内容,以正在接受正规教育的中小學生为对象。

“影子教育”以补充性、私有有偿性、培优补差性等特征著称,国内政策中也常用“课外辅导”“校外培训”等术语指代影子教育,在目前社会主流教育观念的影响下,父母在普遍较高的教育期望推动下,影子教育作为主流教育的补充在我国发展迅速。

(二) 教育期望与影子教育关系

1. 影子教育是教育期望的投射

父母的教育期望是父母对子女未来所受教育的年限或获得的教育程度的期望。随着威斯康辛模型的提出,父母的教育期望被纳入为家庭社会阶层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中介变量

在中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父母普遍对孩子具有更高的教育期望。家长不仅重视孩子的教育,更将学业的成功与实现家庭向上社会流动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内生动力下影子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成为家长提高学业竞争力的重要选择。父母的教育期望越高,越有可能投入更多的资金、时间与精力在孩子身上。他们以实现教育回报最大化为目的,在对教育制度、追求动机和孩子特征等因素的平衡和博弈中进行理性地评估和取舍,最终帮助孩子在教育竞争中争取到尽可能的优势。

在对课外辅导类型的选择上也投射出不同阶层,不同观念父母教育期望的差异性。由于“学习类课程”和“兴趣类课程”所指向竞争优势和教育回报生产的路径存在差异,所以不同教育期望对参加“学习类课程”和“兴趣类课程”的影响程度会存在差异,并且是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选择不同课程类型的中介机制。所以家庭资本对于影子教育的投入方向和投入程度侧

面反映了不同阶层父母教育期望的差异性

2. 影子教育的双面性

影子教育的本质是通过学校之外的市场化教育渠道在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增加学生的学业获得,提升学业成绩并最终转化为社会经济地位优势,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从这一层面来看家庭资本向影子教育的投入是一种家庭投资行为,是现代家庭教育的一种积极选择,正面来看适当的影子教育是有利于弥补学生学业成绩的不足,尤其在学生自我教育期望与学业成绩存在差距的情况下,影子教育是学生实现教育获得的重要手段。通过影子教育的参与,学生的学业成绩有所提升也增强家长和学生两者的教育期望信心。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资本投入到影子教育的市场,家长的教育期望被教育市场所裹挟,随之而来的“内卷”文化开始成为影响教育公平的一大问题。首先,资本参与下过热的课外辅导市场加深了父母的竞争焦虑的同时也加大了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自我预期理论下学业成就与期望的差异可能会使学生内心对未来的发展变得消极。其次在优质的教育资源向资本倾斜时,脱离较为公平的学校教育场所,家庭资本的差异性使得较低阶层的家庭无法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加深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也让这些家庭不得不降低自己的教育期望。

最后是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学习类课程”的教育回报可以在标准化考试的结果中得到反馈,因此参加“学习类课程”是社会各阶层家庭较为普遍的选择。尽管“兴趣类课程”对于孩子认知能力的培养有着突出作用,但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他们对青少年的成长规划缺乏远见,因此他们更加注重短期的教育回报,有限的家庭资本不会选择难以直接转化为学业成就甚至会影响到学业表现的“兴趣类课程”。向功利性倾斜的“课外培训”的市场无疑是对我们国家构想的素质教育的一种阻碍,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兴趣培养和职业选择具有负面影响。

二、双减政策的提出

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一直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高质量”从“减负”“提升”两方面着手,两者不是相互独立的,基于影子教育和教育期望的关系来看,适当的“减负”有助于打造公平的教育平台,减少不必要的竞争,提升学业效果,促进教育向高质量发展。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对中小学生的作业时间、考试安排、培训机构办学等作了严格规定。从政策发布单位以及政策内容的严格程度来

看,“双减”政策都将“减负”问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称其为“史上最严减负令”也不为过。

“双减”工作的总体目标分为两个方面。在校内方面,使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作业布置更加科学合理,学校课后服务基本满足学生需要,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在校外方面,使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全面规范,学科类校外培训各种乱象基本消除,校外培训热度逐步降温。“双减”政策是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减负”减得是资本进场下过热的课外辅导,是资本贩卖焦虑引起的家庭资本投入,减得是教育中不必要的“内卷”式竞争,相应而来的是“增质”增加学生自我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增加认知教育在家庭学校教育中的比重,增加素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空间。

“双减”的真正意义在于落实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让学校教育提质的同时使家庭教育归位,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教育良好生态,缓解资本介入下的教育焦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三、双减政策对家庭教育影响

双减政策的提出是遏制教育“内卷化”竞争式发展的重要手段,是教育发展的必然性,随着资本进入教育市场,在通过贩卖焦虑,引导家庭资本的倾斜投入的过程中引起的教育不公平现象得以缓解。家庭教育的比重加大,引导家长重新思考以功利为导向的教育期望的正确性,使得教育回归家校合作的共构模式,有利于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的公平和良性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家长们的焦虑程度似乎并未因此减轻,在某些方面反而有进一步加剧的倾向。究其原因社会教育大观念和竞争大环境没有跟得上政策的变化,父母高教育期望和学生的学业获得一时间得不到满足,因此“双减”政策对于家庭教育产生了新的问题。

(一) 家庭教育的补位回归

过热的影子教育在双减政策的实施下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中小学生“学习类”课外辅导撤出课外辅导市场,由此而来的是家庭教育的补位回归。家庭和學校是学生社会化发展的主要场地,家庭教育在孩子认知发展和个性培养方面占主导作用,但在过去的家庭教育完全成了学校教育的附属物,在家庭里面进行的教育主要是作业和补习。这样的家庭教育已经没有它的独立性,家庭教育已经丧失了它应该承担的责任。双减政策的实施实现了对家庭教育的“倒逼”家长不得不承担起自身的教育责任,重视家庭文化资本对孩子教育期望和教育获得的影响,切实关注孩子的身心发展,回归教育本位,积极实现家校合作的良性教育发展秩序。

在广东省家庭教育促进会开展的《双减政策对家

庭教育的影响调研项目》中,家长普遍对“双减”政策持积极态度,64%的家长认为“双减”政策对其教育行为有影响,影响最大的是亲子陪伴与沟通,其次是兴趣爱好的培养,父母的教育行为和投入逐渐回归“育人”的教育本质。

(二)“双减”后父母的教育焦虑

《双减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调研项目》结果同样也显示“双减”政策的实施下调查对象中36%的父母存在教育焦虑,尤其是对“双减”政策持观望和反对态度的家长,焦虑程度更高。家长焦虑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没有转变的社会竞争大环境和教育观念,为了实现阶层的向流动的目标,家长的教育期望依旧是以纵向的学历期望为导向,加之资本变相的以“高端家政”“众筹私教”“游学研学”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家庭资本投入教育竞争的现象短时间内无法遏制,所以没有足够家庭资本投入的父母自然会越发的焦虑。所以,仅仅是让家庭资本“无处可投”,不过是扬汤止沸,只有让家长们转变了观念,认识到子女的教育不是靠金钱和时间堆出来的,从而淡化资本投入的意愿,才是釜底抽薪的做法。

另一方面在中国教育体制和高考制度的影响下,学业成绩依旧是衡量一个学生能否接受更优质教育资源,获得更高教育成就的关键标准。没有了适当的课外辅导,中小学生课业提升成为家长不得不面对和承担起的责任。具有一定家庭文化积累的家庭可以通过家庭教育弥补孩子学业成绩的不足,而对于阶层较低,没有相应的文化积累的家庭,较低的学业成绩和无法参与的教育竞争不得不使其教育期望降低,放弃对高学历的追求,这也是家长日益增长的教育焦虑的原因之一。

四、完善改革,促进教育良性发展

“双减”的出发点是构建良性发展的教育秩序,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避免不必要的“内卷”式竞争,但如果在减轻“有形”负担的同时,却因为考学晋升制度导致家长普遍性的焦虑问题,以及学生因为学业知识获取问题造成负担的加重并不是政策的初衷。因此我们要切实结合当今教育制度的大背景和家長普遍共有的主流教育观念,分析如何能让家长不再将家庭资本投入到这类给学生“增负”的机构和环境当中,实现真正意义的减负。

(一)升学制度改革,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缓解教育期望和“双减”政策冲突的关键在于考学制度的改革,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高考制度经历了多次改革,旨在发展素质教育,但无论怎样改革都是以笔试为主要考试形式,考试成绩才是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这点从未改变。教育改革要提升综

合素质,在以分数为选拔标准的升学制度下难以落到实处,“双减”政策的提出又加大了综合素质与分数之间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双减”政策与考学大环境是相互矛盾的。在这样背景下要想根本上落实政策,达成素质教育的目标,就不能不关注“需求侧”的改革。要在考学制度上打破“唯分论”,进行科学的素质教育评定体系才能讲家长的关注引向孩子的认知教育和兴趣发展。

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关键在于要切实将学生的综合素质纳入考学评定体系中来,横向丰富高校招生选拔的标准,打破以往的“唯分数论”,科学构建公平合理的综合素质评定体系,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重心从“育分”转向“育分+育人”。这样才能使“双减”之后的课后服务更有效的参与学生的身心发展,实现“减负提质”的目标。

(二)职业教育观念的改革

家长的教育期望普遍集中在对于高学历,好学校的追求上,这源于阶层向上流动需求下形成的教育观念,造成的后果是本科考学赛道越来越“内卷”的竞争,职业教育的发展停滞。“双减”政策正是基于此,在政策上给予职业教育一剂强心剂,重新塑造职业教育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2021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对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职业学校、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业成果融通互认等作了规定。4月领导人对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2021年5月,最新的《民促法》实施条例落地后,在法规层面确定了国家鼓励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方针。人社部、财政部等部门共同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完善经费补贴政策,对开展学徒培训的企业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政策上的支持给予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空间和活力,但要在教育层面真正实现职业教育“平等”发展,还需要从教育观念上对其进行“正名”,在就业层面上做到“公平公正”,转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

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就在于教育观念的转变,让人们能够正确认识职业教育,需要国家政策指导的同时加大宣传,只有家长正确认识职业教育,了解职业教育的发展前景,才能将其纳入教育期望的考量范围,缓解焦虑心理,实现中学生群体的多维发展。

(三)完善学校配套设施,大力发展社区教育

家庭教育是个人的成长和发展的关键环节,影响家庭教育的因素有很多,而这其中家庭文化资本直接

影响了家庭教育的效能,是造成教育不公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双减政策下课外辅导班的取缔,让家庭教育成为关键,以往辅导班承担的教育职责由家长接手,不仅实在学业上进行辅导,也要满足孩子个体化发展的需要,这样的趋势下具有高文化资本的家庭优势开始凸显。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设施,这样由资本投入拉大的教育获得差距会逐渐成为实现教育公平的最大阻碍。在家庭文化资本的差距这样客观因素一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功能性就成为了缩小教育获得差距的关键。

完善配套设施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对学校来说面对“双减”政策带来的各种改变要积极应对,以满足学生学业需求。在减轻学生作业负担的同时要合理调整作业结构,提高作业设计质量,用科学方法高效发挥作业巩固提升的作用。面课外辅导班取缔后,学生对学业的各方面需求,学校要积极开展高质量的课后服务,提升教学水平,打造家校合作平台,加强家校沟通,全方位的促进学生的个人发展。另一方面,社区教育的发展,既是满足学生日益增强的个体化发展的需求,也是对家庭文化资本差距的弥合。

(四) 家庭教育立法,助力家校社协同育人

家庭是儿童和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在家庭中父母的日常言行和基本的教育行为为儿童人格发展奠定基础,完成初级社会化进程。但是基于目前社会发展现状,家长对于学校和课外辅导的依赖性变强,家庭教育弱化影响青少年儿童的认知教育和个体化发展,家庭教育的缺失和父母教育观念的“功利化”,造成青少年问题频发,因此国家从立法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回逼”让家庭教育归位,减少青少年越轨和失范现象。在双减政策背景下,202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出台并积极推进,这是中国教育法治化的重要环节,对于完善教育法律体系有着重要意义,从立法层面监督和推进家庭教育,符合目前我国教育发展的需求。《家庭教育促进法》从政策上明晰了家庭的教育职责,对家庭教育的内容上提出了正向的引导,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让父母的责任意识归位,从“功利性”教育的桎梏中走出来。注重孩子的认知教育和人格发展,走向“育人”的正确定位。而这其中由政府监督和引导,厘清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责任边界,通过必要时的介入和纠正助力实现家校社协同育人。

家校社协同育人,首先要健全家校协同机制。家校要构建相互支持、相互参与的育人共同体,通过家委会等组织形式,结合各种链接学校和家庭的活动方

式,定期组织家校交流活动,在交流中明确家庭和学校的职责,结合相应的法律法规防范和杜绝家庭教育的不作为,也让家长对学校的教育方法和教学质量进行有效的了解和监督。其次是加强社会和学校协同机制,积极与相关的社会组织和企业进行合作,借助社会组织的教育资源开展研学、志愿服务等教育实践活动,与热心企业合作,开展职业认知教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社会参与感,促进素质教育。最后家庭教育的指导需要社会教育组织和机构的积极参与,一方面发展社区教育,利用社区资源加强家庭教育的服务工作,借助社区服务平台缓和代际冲突。另一方面利用信息化手段,针对不同家庭需求提供特定的家庭教育网络课程。搭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信息平台,提供家庭教育线上指导与咨询服务。(通讯作者:秦志爽)

参考文献:

- [1] 王甫勤,邱婉婷.家庭社会阶层、教育期望与课外教育——基于CFPS2016的实证研究[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06):87-95.
- [2] 陆一.从家庭教育期望入手认识教育治理问题[J].全球教育展望,2021(11):45-58.
- [3] 郭羽菲.“双减”政策下的家长焦虑与缓解[J].宜宾学院学报,2022(01).
- [4] 周序.家庭资本与学业焦虑——试论“双减”政策引发的家长焦虑问题[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7).
- [5] 李佳丽,胡咏梅,范文凤.家庭背景、影子教育和学生学业成绩——基于Wisconsin模型的经验研究[J].教育经济评论,2016(01):70-89.
- [6] 薛海平,师欢欢.教育均衡化对家庭影子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08):14-24.
- [7] 刘予,贾敏.“影子教育”:不平等呈现、资本传递与再生产路径探析[J].哈尔滨学院学报,2021(11):118-122.
- [8] 周广肃,夏宇锋.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J].经济科学,2021(06):130-142.

基金项目: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东北抗战小说的影像化叙事”(编号:2021B183)。

作者简介: 刘颖超(1995—),女,山东济南人,吉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19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研究方向:社会学。